

从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的记载看明清时期藏人对中原的认知

黄辛建 陈东

内容摘要：朱元璋是汉藏关系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皇帝。明清时期的诸多藏文史籍中对朱元璋的出身、建立明朝的过程及其与佛教的关系等有着较多的记载。文章结合不同藏文史籍成书的时代背景梳理了这些记载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藏文史籍有关中原叙事的资料来源途径及其内容的佛教色彩，总结了藏族史家发掘利用这些资料的发展轨迹和明清时期藏人对中原的认知。

明清时期，在汉藏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密切的大背景下，不少藏文史籍均将有关中原人物、王统更迭、风土人情以及宗教发展的记述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记载，无论其是否与历史真相相符或悖离，皆为汉文正史的有益补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且可为我们认识和探讨历史时期藏族的中原观、尤其是理解汉藏民族交往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深层表征提供重要视角。有关朱元璋的叙事即是其中一例，明清时期一些藏文史籍中对朱元璋的出身、他建立明朝的过程及其与佛教的关系等有着较多的记载。目前，对于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的记载的研究还未见专文论及，藏文史籍中有关中原记载的相

关研究成果也还不多¹。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的记载加以梳理和论述。

一、藏文史籍对朱元璋的记载

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的记载主要见于明清时期。其中,最早记载朱元璋的是成书于1454年的《汉藏史籍》,共有4处。其一为:

先前,在杭州宫殿被蒙古人火烧之时,蛮子之皇子向蒙古皇帝归顺了,但不得信任,被放逐他乡,到了萨迦地方,修习佛法,人群集聚在他周围。此后,蒙古皇帝的卜算师们说:“将有西方僧人反叛,夺取皇位。”皇帝派人去查看,见许多随从簇拥此蛮子合尊,将此情向皇帝奏报,皇帝命将其斩首。赴杀场时,他发原说:“我并未想反叛,竟然被杀,愿我下一世夺此蒙古皇位。”由此愿力,他转生为汉人大明皇帝,夺取蒙古之皇位。²

上文中把朱元璋同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昀联系在了一起,将朱元璋描述为了赵昀的转世。在《汉藏史籍》的另一处记载中,作者称朱元璋是汉僧牟果之子。所云大略为:元朝发兵弹压叛乱,随征的一名十夫长因故寻汉僧牟果代其出征被发现,牟果及其下十名兵士被鞭挞几死,后汉僧反叛,“自称大明王”,后众人拥大明王之子“上帝位,上尊号大明皇帝,成为社稷之主”³。

《汉藏史籍》中其它两处关于朱元璋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均称“蒙古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睦尔被汉人大明皇帝在阳土猴年夺去帝位”⁴。

综合上述内容,《汉藏史集》中所记载的朱元璋是这样的:朱元璋是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昀的转世;转世后成为了“大明王”汉僧牟果之子,最后被拥戴成为大明皇帝。

藏文史籍中关于朱元璋的出身还有一种说法。在成书于1643年的《西藏王臣记》

1 相关研究成果有:张云、曾现江:《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及其研究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5):1-5;石硕:《从藏文史籍中的四个称谓看吐蕃对唐太宗的认知——兼论吐蕃的中原观》,《中国藏学》,2015(3):269-277;韩腾、石硕:《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载看藏族史学观》,《西藏大学学报》,2015(1):66-73。

2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141。

3 《汉藏史集》,1999:141-143。

4 《汉藏史集》,1999:64。

一书中,五世达赖喇嘛称朱元璋是受元朝皇帝派遣前往汉地“收敛赋税”的官员,称“相传妥欢贴木耳为皇帝时,曾派朱太祖(朱元璋)往汉地各处大区,收敛赋税。”⁵在成书于1743年、由松巴堪布·益西班觉所著的《松巴佛教史》之中,对朱元璋的出身及其建立明朝的记载甚为详细。作者称:

从土猴年(公元1368年)起由汉大明太祖皇帝统治,明太祖的族氏来源,作者未得到明确的记载。有的说大明第一代皇帝原是名朱它拉朱(ཇུ་ཐ་ལ་ཇུ)的税收官,因造反而称帝,说其子建文,建文子为永乐。然按现今汉史所载,则第一代皇帝原是皇觉寺僧人。元顺帝时期,天下大乱,以二十三位大盗为首的匪军横行各地。时有匪首率军到皇觉寺,此僧人想若逃跑,则三所依将被拆毁,若降顺则要加入匪军中,遂至佛像前抽签求问,得签上言降顺则吉利,但其不信,将签摔于地,签却直立起来,僧甚感惊奇!于是降顺匪军,成为首领的亲信,匪首死去后,自任这支匪军的首领,逐渐夺得元朝江山。⁶

成书于1773年,由拉卜楞寺寺主二世嘉木样·久美昂波大师所著的《西藏的佛教》一书,与《松巴佛教史》所述内容大体一致,只是多了一些渲染性的形容语句,当依据《松巴佛教史》而成。

在其它的一些明清时期的藏文文献中,还有一些有关朱元璋的记载,但记述较为简单。如成书于1538年的《新红史》中称:“关于汉地佛教重新出现的情况,汉地猪脸皇帝于土猴年取得蒙古王位。”⁷著于1476—1481年的《青史》叙述:“从戊申起即为大明皇帝统治国土。从戊申起到现在丙申年,算来已过一百零八年。”⁸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成书的藏文史籍的记载中,关于朱元璋的出身,出现了“宋朝末代皇帝赵昀的转世”、“汉僧牟果之子”、“元朝的税收官”、“皇觉寺僧人”等数种。与以上说法相对应的是,藏文史籍关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一事亦存在三种表述:一是汉僧牟果自称“大明王”,攻下元都后“将此大明王之子拥上帝位”,其子即赵昀转生的朱元璋;二是朱元璋利用外出收税之机,以解运赋银为名,围困皇宫,逼走元帝,代元而有天下;

5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96。

6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506—507。

7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35。

8 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34。

三是朱元璋为保存佛教寺庙、佛像及经典，被迫投降叛军，后成为叛军之首，灭元称帝，建立大明朝。

二、对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记载的分析

据《明实录》、《明史》等官修正史记载，朱元璋为江苏沛县人，本出身贫贱，上过短期私塾，后因家贫辍学；1344年，濠州旱灾、蝗灾频发，瘟疫遍地，其家人相继病死，被迫到皇觉寺出家；不到2个月，皇觉寺也因灾荒取消僧侣的供应，他只得离寺在淮西一带乞讨；1352年，朱元璋投奔濠州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很快引为心腹；1368年，朱元璋称帝，成为大明开国皇帝。但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发现，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的记载分歧和差异较大，不仅与汉文史籍的记载有出入，而且不同的藏文史籍的叙述也千差万别。

1. 关于朱元璋的四种出身

首先，对于宋朝末代皇帝赵昀转世一说。这一表述仅见于《汉藏史籍》之中。将朱元璋作为“赵昀的转世”当是作者的附会。对于赵昀，汉藏文诸多史籍中均有记载。据《宋史》、《元史》等汉文文献记载，1276年，伯颜率蒙古大军至临安，年甫7岁的南宋德祐帝赵昀随之降元，被封为瀛国公，后于1288年被迫出家，被遣至藏地学习佛法。但是，被封为瀛国公的赵昀出家后的境况若何？死于哪一年？怎样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汉文史籍未作说明，成为了明清之间的一桩疑案，引起种种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传说是“元顺帝乃瀛国公之子”。然而，通过对《红史》、《青史》、《新红史》、《贤者喜宴》及《松巴佛教史》等藏文史料的发掘发现，瀛国公赵昀到藏地后常住于萨迦大寺，曾任主持，更名合尊法师，成为了名望较高的高僧大德，1323年被赐死于河西⁹。我们现在已无法考证作者为何将朱元璋附会为赵昀的转世，但作者在叙述朱元璋的出身时加入佛教因果循环因素，将曾任萨迦寺住持的宋朝末代皇帝赵昀附会为朱元璋的前世，这在当时的政治价值和宗教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其次，对于汉僧牟果之子一说。这一表述同样仅见于《汉藏史籍》。作者提出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据《汉藏史集》的记载，作者系“据当时从乌斯藏到朝廷去的法

9 王尧：《藏汉文化考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66-70。

师们的谈论”¹⁰。也就是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在著作中对朱元璋进行的长达 1600 余字的描述来于曾亲往明廷的藏地高僧们的言论，即系据藏地僧人在中原内地的“道听途说”而成。那么，既然此一说法来自于中原地区，我们是否能在汉文史籍中找到类似的记载呢？通过对汉文史籍的检视，我们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印证史料。

再次，对于元朝官员一说。此说见于《西藏王臣记》一书中，《松巴佛教史》中所称的“有的说明明第一代皇帝原是名朱它拉朱的税收官，因造反而称帝”这一说法当是参照《西藏王臣记》而来的。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汉藏史籍》还是《西藏王臣记》，对于朱元璋的出身问题均系采自传闻，这可能与朱元璋得天下后明廷对外讳言其家庭背景有关，才导致民间有多个版本流传，或言其为僧人之子，或言其为收税官等，并传播到藏区得载于藏文史籍，而这些传闻反倒在内地逐渐“湮没”。

最后，对于皇觉寺僧人一说。此说首见于《松巴佛教史》之中，《西藏的佛教》沿袭了这一说法。这两部藏文史籍均成书于清代中叶。在《松巴佛教史》文中有关朱元璋出身的记载中，作者列出了朱元璋为元代的税收官和皇觉寺僧人两种叙述。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作者先是称他未在藏文文献中找到明确的记载，但根据一些说法称朱元璋系元代的税收官。可见，《松巴佛教史》对此前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出身的叙述是持怀疑态度的；同时采用了“现今汉史”的记载，称朱元璋系皇觉寺僧人。

2. 关于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

有如下两种说法：一是父亲起事“坐拥天下”。此说见于《汉藏史集》之中。该书描述了“汉僧牟果”的起事及朱元璋继位的过程，颇为形象生动。大致为：先是汉人占卜者称：“现在皇位有失落的危险，如果让皇太子现在继位，还可以禳解此灾。”但太子坚决不允。此时，“适值发兵前往蛮子地方弹压之际，乃命太子为元帅”前往镇压，“建大功业”。此时，宫中卫军中有一名十夫长，“彼自身染病，儿子幼小，又寻不着他人代替出征”，不得已之下，“乃将此情告诉结有善缘、平素常以财物供养之汉僧牟果，求他前去”，汉僧“顾念施主之情，又见有食粮等享用，遂穿上军衣出征”，被发现后被“鞭笞无数，几乎死去”。不久后，此汉僧乃倡言反叛，自称为“大明王”，众人响应，“权势逐年增长”，与当初请他代替出征的施主以及他当十夫长时的朋友部下等里应外合，夺取了政权。此后，众人“将此大明王之子拥上帝位，上尊号大明皇帝，成为社稷之主”¹¹。

¹⁰ 《汉藏史集》，1999：141。

¹¹ 《汉藏史集》，1999：141—143。

二是自己起事“代元而有天下”。此说见于其它对朱元璋有所记载的明清时期的藏文文献之中。具体来看,在《西藏王臣记》中,作者称作为元朝的官员的朱元璋借外出收税之机,其“与少数汉官共谋,造大车多辆,下层藏匿兵丁,上置珠宝绸缎,伪作解运贡赋,驱车直至王宫附近,立即围困皇宫,元帝乃自暗门逃遁,朱元璋遂代元而有天下。”¹²《松巴佛教史》和《西藏的佛教》则根据汉史的记载,描述了朱元璋从一名皇觉寺僧人,为了保护佛教三宝,投靠起义军并成为首领,最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明朝。

3. 关于朱元璋与佛教的关系

在明清时期藏文史籍关于朱元璋的叙述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尽可能地将其与佛教相联系。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将朱元璋的出身与佛教联系在一起。在《汉藏史籍》中,作者在对宋代最后一位皇帝赵㮮的描述中,叙述了赵㮮成为萨迦派上师并受人尊敬的过程,将朱元璋描述为赵㮮的转世。同时称朱元璋之父是名为牟果的汉族僧人,因报元官中一名十夫长的“供养”之恩,顾念施主之情,遂穿上军衣替其出征,被发现后受到残酷的惩罚,后依托寺庙反元而得天下¹³。在《松巴佛教史》和《西藏的佛教》中,则强调了朱元璋作为皇觉寺僧人的身份,渲染了其为保存佛教寺庙、佛像及经典,被迫投降叛军,后成为叛军之首,灭元称帝,建立大明朝的经历。

其次,是记载了朱元璋所采取的宗教政策。在《西藏王臣记》中,五世达赖喇嘛高度评价了明朝对藏地的佛教政策,并对明代多位皇帝进行了佛教色彩的渲染。同样,《松巴佛教史》的作者强调了朱元璋为保存佛教寺庙、佛像及经典,被迫投降叛军,后成为叛军之首,灭元称帝,建立大明朝;叙述了朱元璋同藏传佛教噶举、止贡间的密切关系,称“明太祖虽未像元一样统治西部和北部,但国力强盛,同噶举、止贡间关系密切,对僧、苯波(道师)、儒(明学)三教一视同仁”¹⁴。

三、藏文史籍有关朱元璋记载的背景

前面,我们对明清时期藏文文献中有关朱元璋的记载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找出了其

¹² 《西藏王臣记》, 2000: 96。

¹³ 《汉藏史集》, 1999: 141 - 143。

¹⁴ 《松巴佛教史》, 2013: 507。

中的一些差异。那么,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呢?下面,我们结合这些藏文史籍的作者撰写时的时代背景来进行分析。

最早出现有关朱元璋记载的藏文史籍《汉藏史集》成书于1454年。此时正值景泰帝(1449—1457年)在位时期。此时,明王朝对待藏区政教首领采取怀柔政策,凡来者辄授予官职,并对僧俗首领丰赏厚赐,故向中原流动的藏人数量、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根据石硕教授的统计,宣德(1425—1435年)、正统(1435—1449年、1457—1464年两次在位)年间西藏朝贡人数一般为30—40人。到了景泰年间,人数陡然增至200—300人,到天顺(1457—1464年)年间猛增至2000—3000人¹⁵。这样一来,藏地高僧大德、地方首领在汉地的所闻所见和实际体验,自然成了《汉藏史籍》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生活年代前后藏地史家的通用手法,这也正是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撰写《汉藏史籍》中有关朱元璋内容的信息来源渠道。《汉藏史集》中对中原人物和史实的记述采自前往汉地高僧大德的“道听途说”并不仅限于有关朱元璋这一例,其有关五代十国、宋、辽、金的历史系“根据赞跋拉多斯袞所说而记录”,有关金国到明代的王统更替的历史来自于“日辛巴之上师细顿去汉地献马并朝见皇帝后所说的史实”¹⁶。在其他同时期的藏文文献中,著于1376年的《雅隆尊者教法史》一书中的五代与宋的历史“系瞻巴拉国师怙主所述书之”¹⁷,著于1476—1481年的《青史》中关于元代的历史则“据说系藏跋拉即吉祥怙主所说,袞嘎多杰(普庆金刚)所记”¹⁸,在1538年成书的《红史》中,其“汉地由梁至南宋的历史简述”一节是“依赞巴拉德室利袞所说而写成的”¹⁹。

到1643年五世达赖喇嘛撰写完成《西藏王臣记》之际,藏地的政教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638年,固始汗率领和硕特蒙古军队在格鲁派势力的支持下自青海进入康区。1641年,白利土司被击败后逃走。不久后,白利土司被俘获,并在昌都地区被活埋入泥坑之中而死。《西藏王臣记》成书的前一年,固始汗的军队进入卫藏地区,并击败藏巴汗政权,藏区由此进入以固始汗为首的和硕特蒙古部落统治时期。此时,虽然五世达赖喇嘛在和硕特蒙古的支持下成为卫藏的政教领袖,但清朝尚未正式一统中原,明清两朝的王朝交替尚未完成,事关明朝史事之类的史籍资料还未开始编修。例如,被誉为《明史》在1679年(康熙十八年)才正式组织班子编写,到1739年(乾隆四年)

15 石硕:《历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区的流动及与西藏社会发展的关联》,《中国藏学》,2012(2):36。

16 《汉藏史集》,1999:141。

17 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25—27。

18 《青史》,2003:27—33。

19 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21。

才最后定稿，进呈刊刻。《西藏王臣记》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其有关明朝的叙事并无汉文史料作为支撑，仍系源自藏地高僧的旧说。不过，在有关朱元璋建立明朝一事上，《西藏王臣记》显然较《汉藏史集》更进了一步，即朱元璋系自己起事“代元而有天下”，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父亲起事“坐拥天下”的。

与《汉藏史籍》及《西藏王臣记》所不同的是，《松巴佛教史》、《西藏的佛教》等藏文史籍分别成书于1743年和1773年。此时已是清代中叶。一方面，明朝在当时已经成为“过去”，有关朱元璋的出身及其建立明朝的历史不再有秘密可言；另一方面，清朝对明史的编修工作也已经完成并刊刻出来；同时，由于清代汉藏文明交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量汉地历史书籍被译成藏文，从而给藏地史家提供了权威的史料来源。《松巴佛教史》作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说，其对于朱元璋所述系依据“现今汉史所载”，并说“有不少关于汉地王统的史著陆续被译成藏文”²⁰，当指此而言。因此，但相较上述两部藏文史籍而言，《松巴佛教史》、《西藏的佛教》两部藏文史籍有关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表述与汉文史籍的记载最为接近，这显然与其当时已具备参阅汉文史籍的条件有关。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藏族对朱元璋及其建立明朝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西藏与内地、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与交往不断加深，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的叙述也最终接近了汉文史籍的记载，藏族对中原的认知也愈加客观、认同度也不断增强，而这正是西藏文明不断向中原靠拢的内在驱动力。

四、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对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记载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是藏文史籍有关中原叙事的材料来源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道听途说”，即来自有汉地游历背景僧人或藏区前往内地朝贡僧俗首领的口耳相传。对于“道听途说”的材料，现今大多已无法在汉文献中找到可印证的史料。究其原因，可能为中央王朝统治阶层出于政治需要刻意遮掩而致使汉文史籍“故意”出现漏载，也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且已佚失的坊间传说，但无意间却经游方僧人之口被录入了藏文史籍。值得珍视的是，有些“道听途说”恰恰弥补了汉文正史的缺环。有关南宋末代皇帝德祐帝赵昰即为典型案例。因此，对于这些“道听途说”材料，可视为汉

20 《松巴佛教史》，2013：502。

文史籍的重要补充,其对我们今天更加全面深入认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参阅汉地正史材料。对于参阅汉地正史材料修史,应是藏地史家的一个传统。藏族学者根敦群培在其历史著作《白史》中就说,《新唐书·吐蕃传》在元代时曾被藏族学者十分看重,并由译师姜主安辛与仁青扎巴国师译成藏文而被藏文史书大量引用²¹。在后弘期,以《新唐书》为代表的大量汉文史籍被翻译为藏文在藏地广泛传播。在《新红史》²²、《萨迦世系史》²³、《雅隆尊者教法史》²⁴等藏文文献中,作者论及中原史实时就直接提出利用了汉文典籍。成书于1388年的《西藏王统记》一书对于“汉土霍尔两地佛法如何宏扬和出现若干朝代等情”系“根据精通汉族霍尔史籍之曾泽大师·喜饶耶协在贡塘所译历史”²⁵。不过,能参阅正史显然是有其前提条件,即通过汉藏间的频繁接触与密切联系,藏人得以有机会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原汉文典籍并将其译为藏文。《松巴佛教史》、《西藏的佛教》记述朱元璋事迹较之《汉藏史籍》、《西藏王臣记》更接近历史事实,显然与其当时已具备参阅“现今汉史”条件有关。

由上可见,不管是通过“道听途说”,还是参阅汉地正史材料并最终呈现在藏文史籍中有关中原的记载,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汉藏关系史及中原地区历史相关史实的澄清、补充和纠谬作用,从而完善对汉藏关系历史面貌的认识与理解”²⁶,乃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汉藏关系、深化中原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

第二,藏地史家在叙述中原史实时习惯将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与佛教相联系,即将汉地史实用佛教思维方式加以表述。

事实上,这种将汉地历史人物与佛教相联系的现象普见于后弘期藏文史籍。如成书年代不晚于12世纪的《拔协》称唐太宗“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他有360部经典,被誉为汉地的经典皇帝。”²⁷孙林先生对此曾指出,“就藏族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而言,我们首先遇到一个最显著的现象是,拥有较为庞大史学群体的藏族史学在史学观念上带有很浓重的神权历史学或宗教历史学的色彩。”²⁸如《汉藏史籍》言南宋末帝赵昀转世为朱元璋、朱元璋之父为僧人,《西藏王臣记》、《松巴佛教史》、《西藏的佛教》等在叙事时也

21 根敦群培著:《根敦群培文集精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148-149。

22 班钦索南查巴、黄颢译:《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10-15。

23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173。

24 《雅隆尊者教法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25-27。

25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2-16。

26 张云、曾现江:《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及其研究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5):5。

27 拔·赛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2。

28 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9。

着重突出朱元璋与佛教的关系。其他后弘期藏文史籍在叙述中原史实时也莫不如此。至于此点,可能与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不断勃兴,以《教法史》、《王统记》为主体的后弘期藏文文献主要为藏地高僧大德所著有关。可见,以佛教思维看待中原历史,或将中原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纳入佛教文化体系,或将重要人物与佛教的关系夸大化是其叙事的一贯风格。

第三,藏文文献对朱元璋的记载,在很大程度反映了明清时期藏人对中原的认知。从不同年代藏文史籍对朱元璋有关记载来看,呈现出由初期的“道听途说”——采信于他人,到后期直接参阅史书——“按现今汉史所载”的转变。藏族史家对中原地区历史阐释态度与观点的转变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以西藏与中原及藏汉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为首要前提,这体现了藏地史家在书写汉地历史时不囿于成说并尊重汉地历史事实的精神。正如张云等学者所言:“这些记载以其独特的方式折射出藏族史家从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等立场出发,阐发了他们对中原地区及中原历史、文化的态度与观点,其内容既包含了古代藏族的中原观,也从观念层面深刻地反映了古代藏汉民族之间深层次的内在关系。”²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后弘期藏地史家加强西藏与中原认同在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重要表征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明清时期藏人对中原的认知及藏人的中原观。

◆ 黄辛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联合培养在站博士后,阿坝师范学院副教授
陈东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29 张云、曾现江:《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及其研究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5):5。